

從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看《三國演義》 的成書年代及版本演化（上篇）

李定遠

《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言人人殊，迄今為止，主要有五種說法：（一）成書於宋代乃至以前；（二）成書於元代中後期；（三）成書於元末；（四）成書於明初；（五）成書於明中葉。詳情沈伯俊已有交代，¹不贅。學者在探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時，用了不同的方法，有從考證書中小字注來推斷的，有從考證書中語句來作推斷的，也有從考證書中出現器物或與其他作品作比較去推斷的。

馬幼垣在研討《水滸傳》（下稱《水滸》）的成書過程時，通過考察朱有燉（1379–1439）的兩本水滸雜劇去推斷《水滸》的成書年代。馬發現朱在宣德八年（1433）寫那兩本水滸雜劇時，僅參閱過《水滸》成書前的水滸傳統文學作品（如《宣和遺事》），對於《水滸》，像「視若無睹」般，故認為《水滸》於宣德八年尚未成書。²

朱有燉是明初明皇室的藩王，一直醉心於雜劇創作，是中國戲曲史上重要的雜劇作家，日本學者八木澤元稱之為「明代第一雜劇作家」。³朱博學多聞（因其博聞多能而諡為「憲」，世稱「周憲王」），若《水滸》當時已成書，朱沒理由視而不見。

筆者認為在研究《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上，也可運用上述的方法。朱有燉所編撰的雜劇中，《新編關雲長義勇辭金》（下稱《義勇辭金》）便是一本講述三國史事的雜劇。我們可通過考察該劇，去探究《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義勇辭金》與《三國演義》的比較

學者也曾研究過《義勇辭金》，例如張志合便以考察《義勇辭金》為手段去探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⁴然而張氏對《義勇辭金》一劇的考察，在合共四頁的文章中，僅

¹ 沈伯俊：〈世紀課題：關於《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2期，頁58–62。

² 馬幼垣：〈從招安部分看水滸傳的成書過程〉，載馬幼垣：《水滸論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頁141–76。

³ 八木澤元（著）、羅錦堂（譯）：《明代劇作家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66年），頁39。

⁴ 張志合：〈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5期，頁24–27。

佔不足一頁，而有關的考察在全文中也只作旁證，未免不夠全面深入。此外，張氏也忽略了版本問題，探討的對象僅為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

筆者認為有關的考察和探討尚有可發揮之處。根據《義勇辭金》的序言，⁵該劇寫於永樂丙申年（1416）。⁶內容主要講述關羽降曹，刺顏良及辭曹的故事。《三國演義》也有有關的故事，在嘉靖壬午本中為卷五〈張遼義說關雲長〉回至卷六〈關雲長千里獨行〉回，⁷毛評本則為第二十五回至第二十七回。⁸在《義勇辭金》寫成前，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下稱《平話》）也有有關的故事。⁹本文的上篇旨在仔細比較《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的相關部份，並考察史籍及《平話》一類的三國傳統文學作品，從而探討《三國演義》一書的成書時代；下篇則主要探討《三國演義》成書後的版本演化。

比較分析的原則

在比較《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前，必須定出一些原則。我們不能因《義勇辭金》與《三國演義》相應部份的內容不同，便斷定朱有燾編寫《義勇辭金》時沒有參考過《三國演義》，再推斷《三國演義》於1416年尚未成書。若以兩者內容相異去證明朱撰劇時沒參閱過《三國演義》，是否也可以兩者內容相同去證明朱撰劇時曾參閱過《三國演義》？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必須明白相關的三國史事軼聞於《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成書前已存在，《義勇辭金》在內容上與《三國演義》相同，並不代表朱在編劇時曾參閱過《三國演義》，因為早已存在的三國史事軼聞，朱和《三國演義》的作者皆可採用。同樣道理，我們絕不能僅就《義勇辭金》的部份內容異於《三國演義》的相應部份

⁵ 陳萬鼎（主編）：《全明雜劇》影印明周藩自刻本（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2163–2212。本文引用《義勇辭金》以此本為主，由於此本部份文字模糊不清，故筆者另參郭勛（1475–1542）（輯）：《雍熙樂府》，《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中相關的曲詞。《義勇辭金》曲詞與《雍熙樂府》輯錄曲詞的對應情況，可參嚴敦易：《元劇斟疑》（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168。

⁶ 《全明雜劇》，頁2166。

⁷ 本文所用的嘉靖壬午本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明嘉靖壬午年刊本，1974年）。

⁸ 筆者參閱了數個毛評本：（一）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名《貫華堂第一才子書》；（二）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13輯三國演義專輯第8（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影印三槐堂刊本；（三）福文堂嘉靖十九年（1814）刊本，奧地利國家圖書館（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藏；（四）老會賢堂刊本，是一個三國水滸合刻本，名《繡像漢宋奇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五）致遠堂、啟盛堂刊本，為毛宗崗、李笠翁批語俱有的本子，雙紅堂文庫藏。本文毛評本的引文主要按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⁹ 《三國志平話》，《古本小說集成》影印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39。

而斷定朱撰劇時沒參閱過《三國演義》，因為朱在撰寫該部份的內容時，可能因種種原因不取材於《三國演義》而取材於早已存在的三國史事軼聞。¹⁰

茲就上述的考慮，定出下列數條原則：

- (一) 有關內容史書沒有具體記載，《三國演義》和相關的三國傳統文學作品(如《平話》)皆有相關的敘述，朱取材於傳統文學作品而不取材於《三國演義》，我們可以此考慮《三國演義》當時未成書，因為一般來說，《三國演義》的內容遠勝於那些作品，朱捨優取劣，不合常理；
- (二) 承上條，那些作品於該部份的內容並非比《三國演義》更優勝；
- (三) 承上條，那些作品於該部份的內容並非比《三國演義》更能突出忠義的主題；
- (四) 有關內容史籍(如《三國志》)有具體記載，《三國演義》也有相關的敘述，而《三國演義》的敘述比史書的記載更能突出忠義的主題，朱取材於史書而不取材於《三國演義》，我們也可以此考慮《三國演義》當時未成書；
- (五) 主要以嘉靖壬午本的內容作比較，但須注意其他版本的內容。

本文上、下篇皆涉及《三國演義》諸種版本的考察，這些版本包括：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¹¹、夏振宇刊本¹²、李卓吾評本¹³、鍾伯敬評本¹⁴、毛評本、李笠翁評本¹⁵、雙峰堂刊本¹⁶、評林本¹⁷、聯輝堂刊本¹⁸、楊閩齋刊本¹⁹、湯賓尹本²⁰、喬山堂刊

¹⁰ 朱有燉《義勇辭金》的序言明言：「予嘉其行為，作傳奇以揚其忠義之大節焉。」若早已存在的三國史事軼聞於某些地方比《三國演義》更能表現關羽的忠義，相信朱會取史事軼聞而棄《三國演義》。

¹¹ 《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影印明萬曆十九年(1591)刊本。

¹² 收入陳翔華(主編)：《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續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日本蓬左文庫藏本，2005年)。

¹³ 清綠蔭堂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¹⁴ 明末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

¹⁵ 筆者手頭上僅有以首都圖書館藏本為底本的排印本，收入《李漁全集》第10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而首都圖書館藏本該為清兩衡堂刊本。

¹⁶ 《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影印明刊本(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年)；卷一至六、十九、二十影印京都建仁寺藏本；卷七、八影印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本；卷九、十影印德國符騰堡州立圖書館(Württembergische Landesbibliothek)藏本；卷十一、十二影印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本；卷十九、二十以英國倫敦博物院藏本補配。

¹⁷ 明萬曆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¹⁸ 劉世德(主編)：《古本小說叢刊》影印明萬曆乙巳年(三十三年，1605)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¹⁹ 《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影印明萬曆庚戌年(三十八年，1610)刊本。

²⁰ 《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影印明刊本。

本²¹、英雄譜本²²、誠德堂刊本²³、朱鼎臣本²⁴、忠正堂刊本²⁵、費守齋刊本²⁶、黃正甫刊本²⁷、藜光堂刊本²⁸、二酉堂刊本²⁹。葉逢春本³⁰雖為重要版本，惟缺相關內容，不合用。

下文就兩書有關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形象及情節四方面作出比較和分析。

故事發生的時間

《義勇辭金》講述的是關羽降曹至辭曹的故事。該劇第一折開首，扮張遼的「外」賓白便有「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得了劉備虎將關雲長，封為偏將軍」句，³¹可知劇中關羽降曹一事發生在建安五年(200)。至於事發在哪個月份，劇中沒明確交代，但第二折扮關羽的「正末」於刺顏良後，有「眾軍可喜，今日凱旋而歸也。正值二月春天路上好景致也」的賓白，³²可以推斷劇中關羽降曹應發生於正月至二月間，而不遲至三月，關羽刺顏良一事則發生在同年二月。第三折，扮甘夫人的「旦」有「自從跟將叔叔來到許昌，不覺過了半年有餘」的賓白，³³之後便是關羽辭曹啟程，張遼、夏侯惇相送的劇情，可知劇中關羽辭曹一事約發生在建安五年七月至八月左右。

《三國演義》也講述了有關的故事，事發的時間跟《義勇辭金》相同。嘉靖壬午本中〈張遼義說關雲長〉回至〈關雲長千里獨行〉回雖沒說明關羽降曹一事發生於何時，但在〈曹操勒死董貴妃〉回中交代了吉平死於建安五年正月。按小說的情節，曹操逼死吉平，擒殺董承等人後，隨即攻打徐州，遂有關羽降曹之事，當中由逼死吉平至關羽投降，該不過一個月，由此可推斷小說中關羽降曹一事發生於建安五年正月至二月左右。至於刺顏良情節發生的時間，小說沒直接說明，但降曹情節既發生於正月至二月左右，刺顏良當不會離降曹時間太遠。小說也沒有直接交代關羽辭曹一事

²¹ 《古本小說叢刊》影印笈郵齋重印本。

²² 《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影印明末刊本。

²³ 《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續輯》影印明刊本。

²⁴ 《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影印明刊本。

²⁵ 《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續輯》影印明刊本。

²⁶ 磯部彰：《費守齋刊『新刻京本全像演義三國志傳』の研究と資料》(仙台：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08年)影印明萬曆庚申年(四十八年，1620)刊本。

²⁷ 陳翔華(主編)：《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影印明末刊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²⁸ 《古本小說叢刊》影印明刊本。

²⁹ 《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影印清翻印本。

³⁰ 西班牙皇家愛思哥利亞修道院(Real Biblioteca del Monasterio San Lorenzo del Escorial)藏。

³¹ 《全明雜劇》，頁2167。

³² 同上注，頁2184-85。

³³ 同上注，頁2198。

所發生的時間，但嘉靖壬午本關羽的辭曹書有「建安五年秋七月」的日期（見〈關雲長封金掛印〉回），可知辭曹情節發生在建安五年七月。

《義勇辭金》講述關羽降曹至辭曹的故事所發生的時間，與《三國演義》所講述的一致，這能否成為朱有燉在編寫《義勇辭金》時參閱過《三國演義》的證據？正如上文所言，相關的三國史事軼聞於《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成書前已存在，朱和《三國演義》的作者皆可採用，故兩者講述的故事所發生的時間一樣，並不能證明朱在編劇時曾參閱過《三國演義》。事實上，按史書記載，關羽降曹、刺顏良及辭曹的史事確是發生在建安五年。

《三國志》記載關羽投降一事發生在建安五年春正月，「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一事發生在二月，然而關羽斬顏良一事則在夏天四月發生，³⁴這不同於《義勇辭金》的講述。雖然史書所載斬顏良一事發生的時間異於《義勇辭金》，但我們不能以此推論朱有燉在編劇時參考過《三國演義》。正如上述，《三國演義》沒直接交代刺顏良情節所發生的時間，我們只能推算有關情節發生的時間當不會離正月或二月太遠。據《三國志》所載，關羽辭曹一事發生於四月至八月之間，³⁵這與上文推算《義勇辭金》中辭曹一事發生的時間沒有衝突。

《平話》也有相關情節，雖沒有明確交代關羽降曹、刺顏良及辭曹發生於何時，但可按話本中其他情節關於年月的敘述作推算。《平話》中獻帝給董成（為「承」字之誤）的詔書日期為「中平九月日」，詔書後敘述吉平參與其事，欲毒殺曹操，繼而敘寫「前後一月，操病發，令人請吉平醫」及吉平欲殺曹操一事。³⁶之後《平話》有下列的年月敘述：

無數日，曹相請玄德筵會……
忽一日，曾〔為「曹」字之誤〕操奏帝言曰……
玄德在路一月，離徐州三十里……
前後無一月，曹兵果至……
無五日，曹兵至城下……³⁷

其後是關羽降曹的情節，由此可推算話本中降曹一事當在中平九年某日後三個月發生。然而東漢年號中平後為初平，而非建安，³⁸中平也沒有九年，這反映了話本作者知識有限。至於《平話》中刺顏良的情節前，有下列的年月敘述：

³⁴ 陳壽(233–297)：《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一〈武帝紀〉，頁18–19；卷三六〈關羽傳〉，頁939。

³⁵ 同上注，卷一〈武帝紀〉，頁19。

³⁶ 《平話》，頁49–50。

³⁷ 以上年月敘述見《平話》，頁50–52。

³⁸ 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頁43。

無數日，將皇叔家小，西去長安現（見）帝……
又數日，皇叔再言……
前後半月，當夜歸館……
無三日，趙雲引皇叔前至信都館裏下了……
數日，與冀王軍相對……
次日，顏良又搦戰……³⁹

這可推算話本中刺顏良一事當在降曹後約一個月發生。

朱有燉在處理關羽降曹至辭曹故事發生的年份上，顯然是按照史籍的。然而，《三國志》明確記載關羽斬顏良一事是在四月發生的。以朱的博學，為何其劇在刺顏良情節後會有「正值二月春天路上好景致也」的賓白？按上述分析，朱在處理刺顏良情節所發生的月份上，該不會是參考自《平話》的。他可能是參考了其他典籍，或因史書記載顏良於二月進攻曹軍陣地，而寫了上述的賓白。

故事發生的地點

《義勇辭金》、《三國演義》和《平話》皆有關羽降曹的情節，然而《平話》在敘述關羽降曹後棲身的地點跟前兩者不同。《義勇辭金》第一折中扮關羽的「正末」有「下邳失守，同嫂嫂甘夫人，引著姪兒，到於許昌」的賓白，而第三折中「旦」有賓白「自從跟將叔叔來到許昌，不覺過了半年有餘」，⁴⁰由此可知劇中關羽降曹後棲身於許昌，這與《三國演義》所敘說的相同。小說敘述關羽降曹後，曹操「班師還許昌」，「已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另與雲長居住」。之後，「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見〈張遼義說關雲長〉回）。顯然，小說中關羽投降後也是棲身於許昌的。但按《平話》的講述，關羽降曹後棲身於長安（今西安），而非許昌，這從話本中有「無數日，將皇叔家小，西去長安見帝」句可證。⁴¹

關於關羽降曹後的棲身之地，《義勇辭金》所敘說的同於《三國演義》而異於《平話》，但這不能成為朱有燉編劇時參考過《三國演義》的證據，因為漢室建安元年（196）遷都許縣，⁴²故關羽降曹後該到許縣面見獻帝，而非長安。朱和《三國演義》作者在處理這問題上，明顯皆是取優捨劣，按史實而不從《平話》。《平話》把關羽降曹後棲身之所寫成是長安，除了反映作者的知識水平不高外，也反映了他對寫作材料處理的粗疏。《平話》卷上所述的一段恩怨因果公案中，已交代「漢高祖生許昌為獻

³⁹ 以上年月敘述見《平話》，頁52-54。

⁴⁰ 《全明雜劇》，頁2168、2198。

⁴¹ 《平話》，頁52。

⁴² 范曄（398-44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80。

帝」，《平話》卷中卻述劉備、關羽和張飛於呂布被斬後到長安見獻帝，⁴³而關羽降曹後也是到長安見獻帝的，與卷上所述的內容相矛盾。《平話》作者在撰寫卷上的恩怨因果公案故事及卷中的關羽降曹至辭曹故事，取材來源可能不同，而《平話》作者並沒有仔細處理這些材料，把彼此矛盾的地方修改好。

《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均敘述關羽於白馬刺顏良，⁴⁴而《平話》卻沒明確提及關羽刺顏良的地點。與上文比較時遇到的情況一樣，這能否成為朱有燊編劇時參考過《三國演義》的證據，關鍵在於史籍的記載是否跟《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所講述的一致。事實上，《三國志》記載了關羽是於白馬斬顏良的。〈武帝紀〉載：「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關羽傳〉也載：「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⁴⁵顯然，《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在敘說刺顏良的故事時均是按照史籍的。

《義勇辭金》刺顏良的情節中，有一點值得我們考察。劇中第三折「末」扮探子向曹操報告關羽刺顏良的情節時，有「從來是有兵塵戰，也不似白馬坡前這一遭」句，⁴⁶劉世德認為傳統京劇《白馬坡》的劇名，以及京劇《甘露寺》中喬國老「白馬坡前誅文丑」的唱詞，是受《三國演義》影響的。「坡」即山坡，「白馬坡」即是一個以白馬為名的山坡。據劉的考證，「白馬」不是山坡，而是縣名。他據《後漢書集解》的注釋指出，「白馬」不僅是縣名，還是津渡名。「白馬」後被稱作「白馬坡」，是由於《三國演義》在講述曹操與顏良交戰時，作了如此的敘述：「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筍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接著，顏良連殺宋憲、魏續二將，又打敗徐晃。曹操請來關羽，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土山觀看」，見「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槍刀森布，嚴整有威」。之後，《三國演義》描寫了關羽刺顏良的精彩場面：

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蠶眉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逕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

⁴³ 《平話》，頁7、48。

⁴⁴ 《義勇辭金》中扮夏侯惇「淨」有「好關將軍，百萬軍中刺了顏良，解了白馬之圍」的賓白，可見刺顏良之地為白馬。見《全明雜劇》，頁2183。

⁴⁵ 《三國志》，頁19、939。

⁴⁶ 《全明雜劇》，頁2192。

劉認為《三國演義》在此敘述了關羽從山上衝到山下，於「山前平川曠野之地」斬了顏良，但這不免給人以山坡近側的感覺，「白馬坡」一詞大概是由此而來的。⁴⁷如此說來，《義勇辭金》的賓白中也有「白馬坡」一詞，這是否也是受《三國演義》影響？是否意味朱有燉編劇時《三國演義》業已成書？

如果「白馬坡」一詞真的是完全受了《三國演義》影響，我們相信《三國演義》成書於朱撰劇之前。然而，《平話》在講述關羽刺顏良時，也敘述了關羽由山上衝到山下：「關公出寨，掉〔當為「綽」之誤〕刀上馬，於高處觀顏良麾蓋，認的是顏良蓋。見十萬軍圍繞營寨，雲長單馬持刀奔寨，見顏良寨中，不做疑阻，一刀砍顏良頭落地。」⁴⁸因此，「白馬坡」一詞不一定是受《三國演義》影響，也可能是受了《平話》影響。《平話》雖沒明確交代關羽於何處刺顏良，但在此情節中曹操讚賞關羽時有「單馬刺顏良，官渡追文丑」句，⁴⁹筆者懷疑「單馬」為「白馬」之誤，與地名「官渡」相對。

從另一角度考察這問題，多個版本的《三國演義》在此情節中，於「白馬」一詞下有字夾注或於頁眉有相關的考證，茲列部份版本作例：

《三國演義》版本	「白馬」一詞的注釋
嘉靖壬午本	白馬，今屬華州。
周曰校刊本	白馬，漢之縣名，屬東郡，本春秋衛之曹邑，三國魏廢之，故址今在太名府城南二百三十里，滑縣治南是也。
夏振宇刊本	
評林本	
李卓吾評本	白馬，漢縣名，屬東郡，今在大名府城南。
李笠翁評本	
英雄譜本	
雙峰堂刊本	
聯輝堂刊本	白馬，地名，今屬滑州。
楊閩齋刊本	
藜光堂刊本	
二酉堂刊本	

若朱撰劇時參閱過《三國演義》，應知道「白馬」是縣名，而非山坡名。我們能否以此推斷《三國演義》於朱編寫《義勇辭金》時尚未成書呢？若能證明上述關於「白馬」的小字夾注或頁眉考證於《三國演義》成書之初已存在的話，這推斷是不無可能的；但根據一些學者的考研，這些小字夾注並非出自《三國演義》作者之手。⁵⁰因此，朱在

⁴⁷ 劉世德：《話三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9-11。

⁴⁸ 《平話》，頁55。

⁴⁹ 同上注，頁57。

⁵⁰ 陳鐵民：〈《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文學遺產增刊》第15輯（1983年），頁93-111；王〔下轉頁209〕

編劇時也有可能參閱過沒有此小字夾注或頁眉考證的《三國演義》。以上述關於「白馬」的小字夾注或頁首考證，推斷《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後於《義勇辭金》，未免過於武斷。

《義勇辭金》沒有關羽誅文丑的情節，但在關羽給曹操的告辭書中有「誅文丑於南陂」句。⁵¹《三國演義》有一回目為「雲長延津誅文醜」，可知關羽誅文醜(與「文丑」同)於延津。《平話》則言關羽誅文丑於官渡。⁵²《義勇辭金》一劇中的辭曹書，顯然是朱有燉鈔錄自其他書籍，而非自創的。《義勇辭金》一劇沒有關羽誅文丑的情節，若該辭曹書為朱所創，何以有「誅文丑於南陂」句？《三國演義》、《平話》皆沒有這封信，史籍也沒有記載。換言之，「誅文丑於南陂」一句是隨著這封錄自其他書籍的信而被朱編入《義勇辭金》的，故信中誅文丑的地點絕非朱襲自《三國演義》、《平話》或史籍的。《三國演義》在關羽降曹至辭曹的故事中，也有一封辭曹書，但內容細節及用詞與《義勇辭金》中的辭曹書不同(關於兩封書信的比較和分析，以及與《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關係，詳見下文「情節的分析比較」部份)。

《義勇辭金》劇中書信提及誅文丑的地點為南陂，其實與史書的記載是一致的。按《三國志》的記載，文醜是死於亂軍之中，而非關羽殺的。《三國志》記述「紹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之後便有文醜被斬的記述。⁵³我們相信延津南面的南阪便是文醜喪命之地。《說文解字》：「阪，陂者曰阪。」⁵⁴故《三國志》所載的「南阪」，其實便是南陂。延津為黃河的渡口，而南陂該為黃河南面的一處山坡。《三國演義》把誅文醜的地點敘說為「延津」，也是按照史籍的。《三國演義》於誅文醜這情節中，也提及過「南陂」。《三國演義》敘述曹操的輜重部隊被文醜攻擊後，「操以鞭指南阜可避」。阜即土山，故《三國演義》的「南阜」與《三國志》的「南阪」及《義勇辭金》的「南陂」，在意義上是一致的。然而，據《三國演義》的敘述，關羽是於河邊斬殺文醜的，故誅文醜的地點該為黃河渡口延津，而非其南面的山坡(見〈雲長延津誅文醜〉回)。《平話》把誅文丑的地點敘說為「官渡」，是其作者粗製濫造三國故事的結果。

[上接頁 208]

長友：〈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兼及《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版本和成書時間〉，《武漢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頁48-53、58。筆者認為只有部份注釋出自作者之手，但這並非本文要探討的重點，若要考研，得另文為之。

⁵¹ 《全明雜劇》，頁2201。

⁵² 「關公怒曰：『焉能不戰！』……至渡口，名曰官渡。至近，關公輪刀，關公誅文丑，覷文丑便砍，連肩卸膊，分為兩段。」(《平話》，頁56)

⁵³ 《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令解鞍放馬誘敵，待文醜大軍分散，「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頁19)。

⁵⁴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304。

《義勇辭金》、《三國演義》及《平話》皆有曹操及其部將送別關羽的情節（《義勇辭金》中僅得曹的部將張遼、許褚及夏侯惇送行），然而《義勇辭金》所敘述的送行地點與《三國演義》及《平話》不同。

《義勇辭金》第四折，在敘說關羽辭曹後，扮關羽的「正末」有「行了一早晨，兀的望見的是八里橋了」的賓白。其後是酒保調戲甘夫人，被關羽痛毆的情節。這情節當中，酒保的賓白便有「自家是許昌之民，在這八里橋開著酒店」句。⁵⁵關羽痛毆酒保後，便是曹操部將張遼等人送行的情節。由此可知，劇中送行的地點是八里橋。

《三國演義》也敘述了送行關羽的那道橋，但從「關公約回數十步，立馬於霸陵橋上望之，見操引數騎飛奔前來」句可知，該橋名為「霸陵橋」，而非「八里橋」。

《平話》也敘說了這道橋：「有智囊先生張遼曰：『先使軍兵於霸陵橋兩勢埋伏。如關公至，丞相執盞與關公送路；關公但下馬，用九牛許褚將關公執之。如不下馬，丞相贈十樣錦袍；關公必下馬謝袍，九牛許褚可以執之。』曹操深喜。先於霸陵橋埋伏軍兵。曹操，許褚，張遼都至霸陵橋上等候。」⁵⁶《平話》的敘說跟《三國演義》一樣，橋名為「霸陵橋」。

周曰校刊本於「霸陵橋」下有一小字夾注：「其霸陵橋在陝西西安府城東霸水上，漢時送行者至此，折柳贈別。」《開元天寶遺事》也有此橋的記載：「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地。故人呼之為銷魂橋。」⁵⁷中國歷來不乏言及灞陵橋送別的詩詞，當中較著名者為李白的〈憶秦娥〉。⁵⁸由此可見，霸陵橋位於西安，為中國古代的送別勝地。

據《三國演義》的敘述，關羽辭曹時，曹操當在許昌，這從小說中關羽得知劉備消息後，與孫乾說「今回許昌，便辭曹公矣」（見〈關雲長封金掛印〉回）可知。然而按小說的情節，關羽當時該由許昌北上袁紹軍營去見劉備，理應不經西安，故小說把送別關羽的地點敘說為「霸陵橋」，實不合情理，這相信是襲自《平話》的。史籍沒有曹操送別關羽的記載，相信這只是小說家言，並非史實。正如上述，按《平話》的講述，關羽降曹後棲身於長安，而非許昌，而中國古代送別勝地霸陵橋又位於長安，《平話》作者把曹操送別關羽之地敘說為「霸陵橋」，便沒有《三國演義》不合情理的問題出現。

《義勇辭金》中的「八里橋」又是甚麼地方？按《許州志》記載：「八里橋：在州西八里，相傳為曹操送關羽之所。」⁵⁹換言之，八里橋位於許昌。現在許昌市城西四公

⁵⁵ 《全明雜劇》，頁2203、2204。

⁵⁶ 《平話》，頁58。

⁵⁷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5。

⁵⁸ 當中有「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句，參吳熊和、蕭瑞峰：《唐宋詞精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4。

⁵⁹ 張良知：《許州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嘉靖刊本，1982年），〈建置二〉，頁十九下。

里有一橋名為「灞陵橋」，相傳原名為「八里橋」。這下子問題變得複雜了。究竟灞陵橋位於長安還是許昌？八里橋又為何變成灞陵橋？八里橋又是何時被傳為曹操送別關羽的地點？筆者相信八里橋被傳為曹操送別關羽的地點，是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正如上文所言，曹操送別關羽並非史實，然而曹操於灞陵橋送別關羽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而不論依據史實或是《三國演義》的敘述，關羽離開曹操時，曹操是在許昌的，但許昌沒有灞陵橋，「八里」與「灞陵」音近，故傳八里橋為曹操送行關羽之地。《許州志》寫於嘉靖辛丑年（1541），故八里橋為送行之地的說法該早在嘉靖年以前。李長需認為許昌的灞陵橋，原名為八里橋，由於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將錯就錯而易名為灞陵橋。⁶⁰至於何時易名，按《許州志》仍載該橋橋名為「八里橋」，該在嘉靖年以後。

從地名受《三國演義》影響而有所改易一事可見，《三國演義》的影響力非常巨大。《義勇辭金》把送別關羽的地點敘說為「八里橋」，是否表示了朱有燉編劇時未受《三國演義》影響，《三國演義》當時尚未成書？若以此去推斷《三國演義》於朱撰劇時尚未成書，則又未免過於武斷。

現存《三國演義》的最早刊本為嘉靖壬午本，而據學界的看法，諸本閩本的刊刻時間雖晚於嘉靖壬午本，然其祖本實有可能早於嘉靖壬午本（關於《三國演義》版本的演化，本文下篇會詳論），故《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實早於嘉靖年間。正如上述，《許州志》仍載該橋橋名為「八里橋」，故「八里橋」易名當在嘉靖年以後。換言之，《三國演義》成書後，有一段長時間八里橋仍未易名。因此，朱撰劇時，《三國演義》的影響力可能尚未如上述般大，而朱在劇中仍把送別關羽的地點敘說為「八里橋」，不能作為《三國演義》於朱撰劇時未成書的論據。

再者，我們考察《三國演義》不同版本的情況，會發現僅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夏振宇刊本、李卓吾評本這幾個版本把曹操送別關羽的地點敘述為「灞陵橋」，其他版本卻沒有如此的敘述：

《三國演義》版本	曹操送別關羽的地點的敘述
嘉靖壬午本	關公約回數十步，立馬於灞陵橋上望之
周曰校刊本	關公回數十步，立馬於灞陵橋上望之
夏振宇刊本	
李卓吾評本	
鍾伯敬評本	
李笠翁評本	回數十步，立馬於灞陵橋上
英雄譜本	公回數十步，立馬於灞陵橋上望之

⁶⁰ 李長需：〈三國地理之許昌灞陵橋〉，《東方今報》，2008年2月28日。

《三國演義》版本	曹操送別關羽的地點的敘述
雙峰堂刊本	公回數十步，立馬於橋上望之
評林本	
喬山堂刊本	
聯輝堂刊本	
楊閩齋刊本	
湯賓尹本	公立馬橋上
朱鼎臣本	立橋上望之
誠德堂刊本	立馬於橋上望之
忠正堂刊本	
費正齋刊本	
黃正甫刊本	
二酉堂刊本	羽回數十步，立馬於橋上望之
藜光堂刊本	
毛評本	遂立馬於橋上望之

因此，《三國演義》成書之初，很有可能並非把送別關羽的地點敘述為霸陵橋，而是後來的某些版本增插進去的。若然如此，朱撰劇時不受《三國演義》影響的說法便不成立。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熟讀《三國演義》的讀者，在閱畢《義勇辭金》後，都會發現夏侯惇這人物在兩書中的形象大相逕庭。《義勇辭金》中的夏侯惇，是一個屢戰屢敗、畏戰無能、邀功嫉妒的窩囊廢。劇中第二折開首，夏侯惇在介紹自己的賓白中，便自嘲屢敗畏戰：「排兵佈陣不曾贏，對壘相持謔了魂，敵國要知吾姓字，我便是畏刀避箭夏侯惇。」⁶¹其後，他與「副末」的對話，更顯出他的智力低下：

淨問：那顏良使甚兵器？

副末云：手執丈二點鋼鎗，身掛七星烏油鎧，頭戴三叉紫金冠，腰繫八寶獅蠻帶。

副末云：將軍使甚兵器？

淨云：他不濟他不濟，算甚好漢，披掛的偌多，□恁的怕上陣時傷着，我卻不怕，你聽我說……

⁶¹ 《全明雜劇》，頁2178。

淨命云：我的軍兵，也不披衣袍鎧甲，也不戴皮盔鐵面，也不用金鼓旗旛，也不使鎗刀弓箭。不與他對相持，不與他苦爭鏖戰，便點起了萬軍卒，一箇人與他一瓣大蒜。

副末問云：你不和他廝殺，卻□與一人一瓣大蒜要怎地。

淨云：你正是不知法，不曾看孫武子兵書。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不算乎？」這不是有蒜多的便得勝了？

在此，夏侯惇被刻劃成一個連「算」和「蒜」都分不清的白癡。⁶²夏侯惇被顏良打敗後，表現得慌張膽怯，求救於關羽。之後關羽刺了顏良，夏侯惇又搶著邀功，說：「我又強。他雖是刺了顏良，也只是殺的他一員大將，他那大勢軍馬，都是夏侯惇領軍，將大髀頭、小髀頭，惇的他走了。」⁶³

劇中第三折通過扮探子的「正末」的賓白，敘說了夏侯惇在戰場上的無能表現：「俺建武將軍夏侯惇。首先出馬，與那顏良交戰無一二合，早敗了夏侯惇。關將軍正在大軍陣裏，勒馬遙觀，只見那夏侯惇被顏良趕的他，袍鬆了玉帶，盔落了紅纓，袍鬆玉帶汗淋漓，盔落紅纓髮披散。」⁶⁴關羽因刺顏良有功，曹操論功行賞，朱有燉又通過夏侯惇的賓白，把他刻劃成一個心存嫉妒的小人：「自家便是夏侯惇。前日相持廝殺，我不曾贏的一陣，倒被那紅臉鬚漢刺了他上將顏良，又解了白馬之圍。今日曹公論功行賞，我心中好生不平，必然將讒諂的言語，着曹公害了那鬚漢，便是平生願足。」⁶⁵後來夏侯惇更欲乘關羽酒醉而加以謀害，幾乎被關羽殺掉。

夏侯惇在《三國演義》中的形象較《義勇辭金》正面得多。就以關羽降曹至辭曹這部份的故事而論：首先，夏侯惇未曾敗於顏良手下。在關羽刺顏良前，敗於顏良手下的曹將為宋憲、魏續和徐晃（見〈雲長策馬刺顏良〉回）。其次，在關羽五關斬將後，夏侯惇曾與關羽作過武藝上的較量，交戰四十餘回合，不分勝負（見〈雲長插鼓斬蔡陽〉回）。由此可見，夏侯惇的武藝不在關羽之下。即使在關羽之下，其距離也不會像《義勇辭金》所描述的那麼大。

《三國演義》作者在處理關羽刺顏良這情節上，與朱有燉不同。《三國演義》作者以宋憲、魏續和徐晃被顏良打敗的情節，襯托出關羽的武藝超群，而朱則安排夏侯惇被顏良打敗。《三國演義》作者這樣的處理可謂合情合理。小說在關羽五關斬將後，敘述了夏侯惇與關羽交戰四十多回合，打成平手。換言之，夏侯惇的武藝不下於關羽。關羽既能斬殺顏良，夏侯惇便沒理由敗於顏良手下。雖然在〈關雲長大戰徐晃〉回徐晃與關羽交戰八十餘回合不分勝負，但當時關羽右臂受箭傷（見〈關雲長刮

⁶² 同上注，頁2179-80。

⁶³ 同上注，頁2183-84。

⁶⁴ 同上注，頁2190。

⁶⁵ 同上注，頁2195。

骨療毒回)，不能以此推論徐晃與關羽的武藝不相伯仲。徐晃被顏良打敗，於全本小說來看是沒有矛盾的。

《三國演義》作者把顏良的槍下亡魂敘述為宋憲、魏續，也是相當高明的做法。《三國志》在記載呂布死後，便沒有關於宋憲、魏續的記載，《三國演義》作者若要將此二人大書特書，欠缺足夠的參考材料。況且，《三國演義》作者從未打算把二人作為小說中的重要人物來寫。《三國演義》安排二人被顏良斬殺，既能襯托關羽刺顏良的神威，又能免卻下文須照應小說中的兩個閒角。

夏侯惇的形象在《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中有如此大的差異，能否證明朱有燉在編寫《義勇辭金》時沒有參閱過《三國演義》？這取決於夏侯惇在史籍及三國傳統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夏侯惇在歷史上的形象與《義勇辭金》所刻劃的截然不同。按《三國志》所載，夏侯惇氣性剛直：「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⁶⁶這與《義勇辭金》中那個畏戰膽怯的夏侯惇宛若兩人。據《三國志》的記載，夏侯惇在軍事上多是於戰役中鎮守後方，或作曹操的從將出征，表現雖不算十分突出，但絕非《義勇辭金》所述說般窩囊。

《三國志》也記載了夏侯惇在政治上的才能：「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陳壽在其傳的最後給予了他正面評價：「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⁶⁷由此可見，朱有燉在《義勇辭金》中對夏侯惇形象的刻劃，並非參考自史籍，當然也不是參考自《三國演義》的。在此，我們不妨以此推斷《三國演義》當時尚未成書，否則以《三國演義》影響力之大，加上史籍中夏侯惇較為正面的形象，而朱所編寫的又是歷史劇，為甚麼要創作一個形象與《三國演義》及史籍背道而馳的夏侯惇呢？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可能是《三國演義》當時尚未成書，而其時的三國傳統文學作品中，夏侯惇的形象都不太正面，即使朱清楚夏侯惇在史籍中的形象，但由於《三國演義》尚未成書，三國傳統文學作品的影響相對較大，因而影響了朱對夏侯惇形象的刻劃。直到《三國演義》出世，流傳漸廣，影響漸大，夏侯惇在《三國演義》中較為正面的形象逐漸取代他在三國傳統文學作品中較為負面的形象。

事實上，《義勇辭金》中關羽刺顏良的故事，是襲自三國傳統文學作品《平話》的。在《平話》裏關羽降曹至辭曹故事的相應部份中，作者安排了夏侯惇被顏良打敗，而且連敗三次，以襯托關羽的超凡武藝。《三國志》僅有關羽斬顏良的記載，並沒有顏良被斬前，顏良打敗了哪些曹將的記載。若朱有燉欲安排曹將被顏良打敗的情節，以襯托關羽的武藝，他只能參考《平話》。當然，《三國演義》也有相關的故事，但正如上文推論，《三國演義》當時並未成書，否則以其影響力之大，而《平話》

⁶⁶ 《三國志》，頁267。

⁶⁷ 同上注，頁268。

於這部份的內容也非比《三國演義》優勝及更能突出忠義主題，朱沒理由棄《三國演義》而取《平話》。若朱真的參考了《三國演義》，《義勇辭金》中被顏良打敗的曹將很可能是宋憲、魏續，而不是夏侯惇。雖然《義勇辭金》沒有夏侯惇與關羽打成平手的情節，朱大可以夏侯惇被顏良打敗以襯托關羽武藝超群，而不用理會與後面的情節產生矛盾，但這安排卻有違夏侯惇的歷史形象。筆者相信，若《三國演義》當時已成書，朱在處理關羽刺顏良的故事上有多一個的參考來源，他應該會選擇宋憲、魏續作為被顏良打敗的角色。那麼，全劇的面貌和現在的應當截然不同。

《平話》對夏侯惇形象的刻劃，雖不如《義勇辭金》般負面(如夏侯惇三次與顏良的交戰中，有兩次都是與顏良交戰三十回合後才被打敗的，⁶⁸這點《義勇辭金》並沒有述說)，但相比《三國演義》，卻較為負面。茲舉夏侯惇攻打新野，被諸葛亮用計打敗的故事為例說明：《平話》述說了夏侯惇被曹操拜為大元帥，將十萬軍攻打新野，先中劉備的埋伏，再被劉封劫寨，逃至古城，於古城令軍隊做飯時，又被劉備的伏軍包圍。夏侯惇突圍，逃至檀溪，軍隊又被諸葛亮以檀溪河水淹殺，以至痛哭流涕。北返途中，夏侯惇遇上張飛，被殺得大敗。夏侯惇鎧甲滿是血污，身負重傷，僅帶不足數十人回到許昌，幾乎被曹操斬首。該役夏侯惇可謂一敗塗地。⁶⁹

《三國演義》也有相關的情節，當中敘述夏侯惇因輕敵而中了諸葛亮的誘敵之計，於山川相逼、樹木叢雜的狹路被火攻，人馬自相踐踏而大敗。雖然與《平話》一樣，夏侯惇被諸葛亮設計打敗，卻沒有《平話》述說般狼狽。夏侯惇回到許昌後，雖面縛跪於階前向曹操請死，但曹操卻令兵士解其縛(見〈諸葛亮博望燒屯〉回)，這與《平話》中曹操於其戰敗後欲斬其首，後因徐庶勸說作罷的情節不同。

從上述的例子可見，《平話》中夏侯惇的形象比《三國演義》的負面。雜劇《諸葛亮博望燒屯》(下稱《博望燒屯》)所講述的也是夏侯惇被諸葛亮設計打敗的故事，當中夏侯惇的形象也是負面的。第二折夏侯惇出場時，便以這樣的賓白來介紹自己：「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上的馬去，番番不濟，到的陣前，則是盹睡，若遇敵將，做不的本對，他輪刀便砍，慌的跳下馬來膝跪。」⁷⁰這賓白明確道出夏侯惇是一個屢戰屢敗、無能膽怯的將軍。劇中第三折通過夏侯惇與卒子的對話，進一步刻劃夏侯惇膽怯畏戰的形象。當夏侯惇與趙雲對陣，夏侯惇問趙雲：「你來者何人？」趙雲答：「某乃趙雲，是你爹爹。」夏侯惇回應：「哎，風大不聽見，再高著些。」如是者三次。卒子見如此情況，跟夏侯惇說：「應的美。元帥，這個喚做罵陣，罵的惱了就廝殺。他說是你爹爹，你可再大著些壓伏他。」怎料夏侯惇叫陣說：「我是你家重孫累孫。」卒子大惑不解地問：「元帥，你怎麼與他做重孫累孫，倒越小了？」夏侯惇答：「我不著你這幾個弟子孩兒，也送不了我。一了說做小做小，天下著了。兩家交

⁶⁸ 《平話》，頁54-55。

⁶⁹ 同上注，頁68-70。

⁷⁰ 《博望燒屯》，收入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上海：涵芬樓，1941年)，頁五上。

馬處，他若是一槍刺下我馬來，恰待要殺。他看一看，他道：是我家重孫哩！」至此，夏侯惇膽小怕死的形象可謂躍然紙上，而從夏侯惇回應趙雲和卒子的話，更可見夏侯惇是近乎弱智的。⁷¹其後，夏侯惇與趙雲又有以下的一番對話：

夏侯惇云：兀那趙雲，你領多少人馬，與我廝殺來？

趙雲云：我領著十萬人馬，與你交戰。

夏侯惇云：你且住者，我揀兵書看一看。他兵十萬，我兵十萬。兀那趙雲，我不與你廝殺。

趙雲云：你怎生不與我廝殺？

夏侯惇云：你的是十萬。孫武子兵書曰：你兵是十萬，我兵是十萬，遇敵兵而不戰；你強我弱，不與你廝殺。

趙雲云：兀那夏侯惇，我這裏十萬人馬，退了五萬，則用五萬，戰你那十萬人馬。

夏侯惇云：我兵十萬，你兵五萬。你退了五萬，肯退了那好兵？都是囊的懦的老的小的癩的跛的，則留下精壯的。孫武子兵書：挑兵而不戰。

趙雲云：我十萬兵都不要，則我一人一騎，與你交戰。

夏侯惇云：等我再看。我兵十萬，他則是一人，越發不戰了。

趙雲云：怎生又不戰？

夏侯惇云：一人捨命，萬夫難當。操鼓來。

這對話具體刻劃了夏侯惇畏戰退縮的形象。⁷²《博望燒屯》也講述夏侯惇中了諸葛亮的計，情節與《平話》大同小異：夏侯惇及其部隊先被趙雲誘至博望城，再被糜竺、糜芳放火燒殺。夏侯惇狼狽逃命時，其部隊先被劉封以插木砲石擊打，再被關羽提閘放水淹殺。這些情節都刻劃了夏侯惇敗軍之將的形象。⁷³最後，夏侯惇在回許昌的路上遇見張飛，稱張飛為「三叔」，自稱「姪兒」、「孩兒」，希望張飛能放他一馬。⁷⁴這與《三國志》中夏侯惇剛直的性格可說是南轅北轍。

《平話》及《博望燒屯》中夏侯惇的形象皆比《三國演義》負面，也不符合史實。相信在《三國演義》成書前，夏侯惇在三國傳統文學作品中的形象都不太正面，直至《三國演義》作者在寫作時，參考了《三國志》、《後漢書》等史籍，才刻劃文學作品中氣性剛直的夏侯惇。然而，《三國演義》作者在刻劃夏侯惇的形象時，也不免受到三國傳統文學作品中夏侯惇的負面形象影響。在《三國演義》中，夏侯惇是性氣剛烈、拔矢啖睛的猛將（見〈夏侯惇拔矢啖睛〉回），但在曹操病危，前往見曹操時，於殿門外

⁷¹ 有關對話見《博望燒屯》，頁十上至十下。

⁷² 有關對話見《博望燒屯》，頁十下。

⁷³ 有關情節見《博望燒屯》，頁十一上至十二上。

⁷⁴ 《博望燒屯》，頁十二上至十二下。

看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及國舅董承等鬼魂，竟嚇至昏倒染病(見〈魏太子曹丕秉政〉回)，幾個月後更因此而病死(見〈漢中王怒殺劉封〉回)。夏侯惇這樣的表現，與其在《三國演義》上半部份所表現出來的形象格格不入。如此前後不一，也讓我們反思究竟《三國演義》是否一人一時之作。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平話》及《博望燒屯》中的夏侯惇形象雖比《三國演義》負面，卻比《義勇辭金》正面。《三國演義》對夏侯惇剛烈形象的刻劃，很大程度是得力於拔矢啖睛的情節，而此一情節已見於《平話》，並非《三國演義》作者自創。由此可見，《平話》中夏侯惇的形象也有較為正面的一面。

朱有燉在編寫《義勇辭金》時，《三國演義》尚未成書。朱參考了《平話》等三國傳統文學作品中夏侯惇的負面形象，並進一步加以醜化，最終刻劃了《義勇辭金》中怯懦無能的夏侯惇。

情節的分析比較

由於《義勇辭金》和《三國演義》中關羽降曹至辭曹的故事皆源自三國史事，因而兩者有不少情節是相同的。分析這些相同的情節無助於我們判斷朱有燉在編寫《義勇辭金》時《三國演義》是否業已成書。因此，本部份將主要分析比較兩者相異的情節。可資分析比較的情節主要有三：(一) 關羽刺顏良前被顏良打敗的曹將；(二) 誰把夏侯惇射瞎；(三) 關羽的辭曹書。

第一點上文已提及並作分析，不再贅言，只想重申這點可作為《三國演義》於朱編寫《義勇辭金》時尚未成書的證據。

《義勇辭金》中夏侯惇曾以下列的賓白介紹自己：「自家夏侯惇的便是，官封建武將軍，在於曹公手下，征徐州上陣時，被呂布一箭，惇瞎了左眼，守濮陽上陣時，被張邈一鎗，惇癱了右腿。」⁷⁵ 由此可見，夏侯惇是給呂布射瞎的。嚴格來說，夏侯惇給射瞎並非關羽降曹至辭曹這部份故事內的情節，但對此作分析比較，有助於我們考察《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三國演義》中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的故事並沒有敘述相關情節，但在〈夏侯惇拔矢啖睛〉回卻有夏侯惇被射瞎的詳細敘述。按《三國演義》的敘述，夏侯惇是給呂布部將曹性射瞎左目的。歷史上夏侯惇的左目是其攻打呂布時給箭射瞎的，至於給誰射瞎，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三國志》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⁷⁶ 流矢是誰發的？《三國志》沒有明確記載。《平話》也講述了這段故事：「呂布軍來迎。夏侯惇出與呂布戰，無數合，呂布詐敗，夏侯惇急趕，呂布發箭，正中夏侯惇左眼。夏侯惇落馬拔箭。夏侯：『父精母

⁷⁵ 《全明雜劇》，頁2178-79。

⁷⁶ 《三國志》，頁268。

血，不可棄之。』其目睛，一口啖之。」⁷⁷據《平話》的講述，夏侯惇是給呂布射瞎的，這與《義勇辭金》所講述的相同。

《義勇辭金》中夏侯惇自嘲被呂布射瞎左眼的賓白，顯然參考自《平話》。朱有燉在《義勇辭金》中極力貶低夏侯惇的形象，這點上節已詳述。呂布在三國傳統文學作品中，多被刻劃成三國第一猛將。曹性是呂布的部將，無論在歷史上或文學作品中，論勇猛他比呂布遜色多了。安排夏侯惇給曹性射瞎，比安排他給呂布射瞎，更能貶低夏侯惇的形象。為甚麼朱仍選擇跟從《平話》的安排，而不選擇《三國演義》的安排？再者，按《三國志》的記載，流矢由呂布部將發出比由呂布發出的可能性更高。若夏侯惇真的給呂布射瞎，呂布並非無名小卒，陳壽沒理由不明確記載。朱取《平話》而棄《三國演義》，主要原因是《三國演義》當時尚未成書，無可選擇。

《義勇辭金》與《三國演義》均有關羽辭曹時給曹操所寫的辭曹書，然而兩封信的文句內容並不相同，茲錄如下。首先是《義勇辭金》的辭曹書：

漢偏將軍關羽，拜上漢兗州牧丞相曹公府下：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羽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托，羽已知。望形立相，覓跡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丑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資，盡在府庫封緘。伏望台慈，俯垂鑒照。關羽頓首，再拜丞相府下⁷⁸

接著是《三國演義》的辭曹書：

漢壽亭侯關某，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某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群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某生於漢朝，少事劉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某所以歸焉。拔擢過望，實難克當。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某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關某狀上（見〈關雲長封金掛印〉回）

上文已提及《義勇辭金》中的辭曹書是朱有燉鈔錄自其他書籍，並非自創。究竟這封信錄自何書？伊藤晉太郎對「關羽文獻」中的關羽書信作了詳細的考證，認為這封信

⁷⁷ 《平話》，頁43。

⁷⁸ 《全明雜劇》，頁2200-2201。

出自誰的創作難以推證。⁷⁹不少文獻均錄有這封信，⁸⁰其中最易得讀的是嚴可均編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題為〈封還曹操所賜告辭書〉。⁸¹嚴可均是清人，《義勇辭金》中的辭曹書絕不可能是朱鈔錄自嚴書的。至於其他錄有此信的文獻，除《古城記》及《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外，全是清人的著作。《漢前將軍關公祠志》約成書於明萬曆年間，故朱也不可能得見。《古城記》今存明刊本，然而部份戲文可能出自宋元人手。⁸²朱能於永樂年間把這封信編入《義勇辭金》中，則這封信很可能於宋元時已流傳民間，但朱所鈔錄的書籍是否與《古城記》有關，難以考證。

這封信顯然不是關羽的手筆。嚴可均的按語便指出：「此後人所依託。」⁸³按史籍的記載，關羽並未誅殺文醜，這點上文已述。關羽辭曹於建安五年，而曹操於建安十三年(208)拜相。⁸⁴這封信若為關羽手筆，絕不會有「誅文丑於南坡」句，也不會稱曹操為丞相。因此，這封信絕對是後人偽託的。

朱有燉把這封信編入《義勇辭金》，旨在加強刻劃關羽的忠義形象，突出《義勇辭金》一劇宣揚忠義的主題。這封信跟《三國演義》的辭曹書，皆不是關羽手筆，也皆表現了關羽的忠義，為何朱選了這封信，而不選《三國演義》的那一封信？就文辭而論，《三國演義》的辭曹書較朱編入劇中的為佳。就內容而論，《三國演義》的辭曹書較《義勇辭金》中的辭曹書更切合劇情，更能突出忠義的主題。《義勇辭金》並沒有關羽誅文丑的情節，「誅文丑於南坡」一句就《義勇辭金》一劇而論顯得有點兒多餘。「主亡則輔」句，與前面「正末」的賓白「我想忠臣不事二君，自從當日，與左將軍劉玄德

⁷⁹ 伊藤晉太郎：〈關於「關羽文獻」中的關羽書信〉，《明清小說研究》2011年第1期，頁35-36；亦見劉海燕：《從民間到經典：關羽形象與關羽崇拜的生成演變史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頁131-32。

⁸⁰ 筆者所見錄有此信的文獻共有數種，其中六種全由《關帝文獻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影印：(一)趙欽湯(撰)、焦竑(訂)：《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影印自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刊本；(二)盧湛：《關聖帝君聖跡圖志全集》，影印自光緒二年(1876)重刊本；(三)王禹書：《關聖陵廟紀略》，影印自清重刊本；(四)葛崙：《聖跡圖志》，影印自清雍正十一年(1733)刊本；(五)周廣業、崔應榴：《關帝事跡徵信編》，影印自光緒八年(1882)刊本；(六)黃啟曙：《關帝全書》，影印自光緒十五年(1889)刊本。另外二種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光緒二十年(1894)黃崗王氏刊本；《新刻全像古城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

⁸¹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九四，頁九下。

⁸² 錢南揚《戲文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云：「此外尚有一部分餘姚腔劇本，也俱無作者姓名，可能大都出宋元人手。今附錄於後：……《新刻全像古城記》——明刻本。」(頁95-96)

⁸³ 〈全後漢文〉，卷九四，頁九下。

⁸⁴ 《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十三年……夏六月，以公為丞相。」(頁30)《後漢書·孝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為丞相。」(頁385)

結義之後，將此身命，永托為臣，我又豈肯別事他人」，以及「吾極知曹公以赤心待我，我雖深感其厚義也，但昔受劉玄德之恩，誓同生死，不可背之也」所表現關羽忠於劉備的態度相矛盾。⁸⁵朱不選《三國演義》的辭曹書，而選了現時在《義勇辭金》中的這一封信，主要原因是《三國演義》當時尚未成書，無選擇餘地。

《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

通過上文的比較，相信《三國演義》於1416年尚未成書。雖然通過比較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未能推論《三國演義》於朱有燉編劇時是否業已成書，但從故事人物形象及情節的分析比較可見，朱撰劇時是沒有參閱過《三國演義》的。朱作為高級的皇室成員，任何當時存世的書籍和文字資料，幾乎能全部得見，並作為編寫劇本的參考資料。⁸⁶他也廣讀小說。⁸⁷若《三國演義》當時已成書，以《三國演義》影響力之大，他不會沒看過，也沒理由在編劇時不參閱。朱編寫《義勇辭金》時沒參考《三國演義》，真相可能如伊維德 (Wilt L. Idema) 所言，《三國演義》當時尚未問世。⁸⁸

讀者會問，朱未能得見《三國演義》，會否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於元末或洪武年間把《三國演義》寫成，但小說一直未被傳鈔或付梓，故當時人未能得見？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但這可能性不大。第一，通俗小說的作者編撰小說，多旨在求利或求名，即使不為名利，也該不會秘不示人。第二，即使《三國演義》寫成後並未立刻付梓，但傳鈔卻是肯定的。嘉靖壬午本中庸愚子的序言便寫道：「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若《三國演義》成書後為人「爭相謄錄」，朱必定看過《三國演義》。第三，某些兵器出現於多個版本的《三國演義》中，但那些兵器出現的年代較洪武末年為晚。⁸⁹若《三國演義》真是寫成於元末或洪武年間，那些兵器沒可能出現於小說中。

因此，1416年《三國演義》尚未成書，1416年可視為《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上限。《三國演義》現存最早的版本刻於嘉靖壬午年，故1522年可視為《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下限。上下限之間有百餘年，《三國演義》就是在這期間成書的。按嘉靖壬午本的序言，在書成前，士君子爭相謄錄。英國學者魏安 (Andrew West) 也以申句脫文 (homoeoteleuton) 證明在嘉靖壬午本出現前，《三國演義》曾以傳鈔的方式流傳一段頗

⁸⁵ 《全明雜劇》，頁2168、2176-77。

⁸⁶ W. L. Idema, *The Dramatic Oeuvre of Chu Yu-tun (1379-1439)* (Leiden: E. J. Brill, 1985), p. 1.

⁸⁷ W. L. Idema, "Zhu Youdun's Dramatic Prefaces and Traditional Fiction," *Ming Studies* 10 (Spring 1980), pp. 20-21.

⁸⁸ Ibid.

⁸⁹ 該兵器為地雷。「地雷」一名最早出現於1402年，見拙文〈從「火燒藤甲軍」及「郝昭燒雲梯」兩個情節看《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版本源流及作者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7期（2007年），頁313-33。

長的時間。⁹⁰由是觀之，《三國演義》雖於1416年尚未成書，但該不會於嘉靖年間才寫成，《三國演義》該在多年前已成書。若相信《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該不會太接近朱有燉撰劇的時間，不妨把《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提前至正統至景泰年間。

當我們把成書年代推證為正統至景泰年間，《三國演義》的作者問題便隨之而生。一般認為《三國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由於羅的生平史料不足，至今最基本可信的只是《續錄鬼簿》的那一條資料，⁹¹故羅的生卒年言人人殊，或認為他是南宋末年人，或認為他是元朝人，而現今大多學者皆接受魯迅的推論，認為羅的生卒年約為1330至1400年。⁹²但卒於1400年的人，如何寫成一本於1416年尚未成書的小說？這是否意味羅並不是《三國演義》最後的寫定者？⁹³按上文的分析和推論，羅理應不是《三國演義》最後的寫定者。然而，多個版本的《三國演義》均署羅貫中撰，對於羅為《三國演義》最後寫定者這說法，我們目前還是不要全盤否定為佳。

雖然我們不宜完全否定羅的著作權，但除了《三國演義》的作者署名外，沒有其他更確切的證據證明羅為《三國演義》的最後寫定者。此外，有兩點我們需要留心：第一，現存某些講史小說皆有羅貫中的署名，但其實是託名之作，如《隋唐兩朝志傳》及《殘唐五代史演義傳》；⁹⁴第二，上述《續錄鬼簿》中那一條關於羅的資料，在介紹羅的作品時，只介紹三種雜劇，絲毫沒有提及《三國演義》。講述三國故事的風氣於宋代已甚盛行，⁹⁵「說三分」在瓦舍為一個專科。⁹⁶至元代，不少雜劇均以三國故事為題材。⁹⁷可想而知，《三國演義》成書一事對當時人的震撼程度是多麼的大，而事實上《三國演義》在後來的影響力也非常巨大。若《三國演義》真為羅貫中所作，《續錄鬼簿》編者與之為忘年交而不提及其代表作，就令人有些費解了。

⁹⁰ 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30。

⁹¹ 《續錄鬼簿》內有羅貫中小傳：「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見賈仲明（撰）、馬廉（校注）：《續錄鬼簿新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頁148。

⁹²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局，1996年），頁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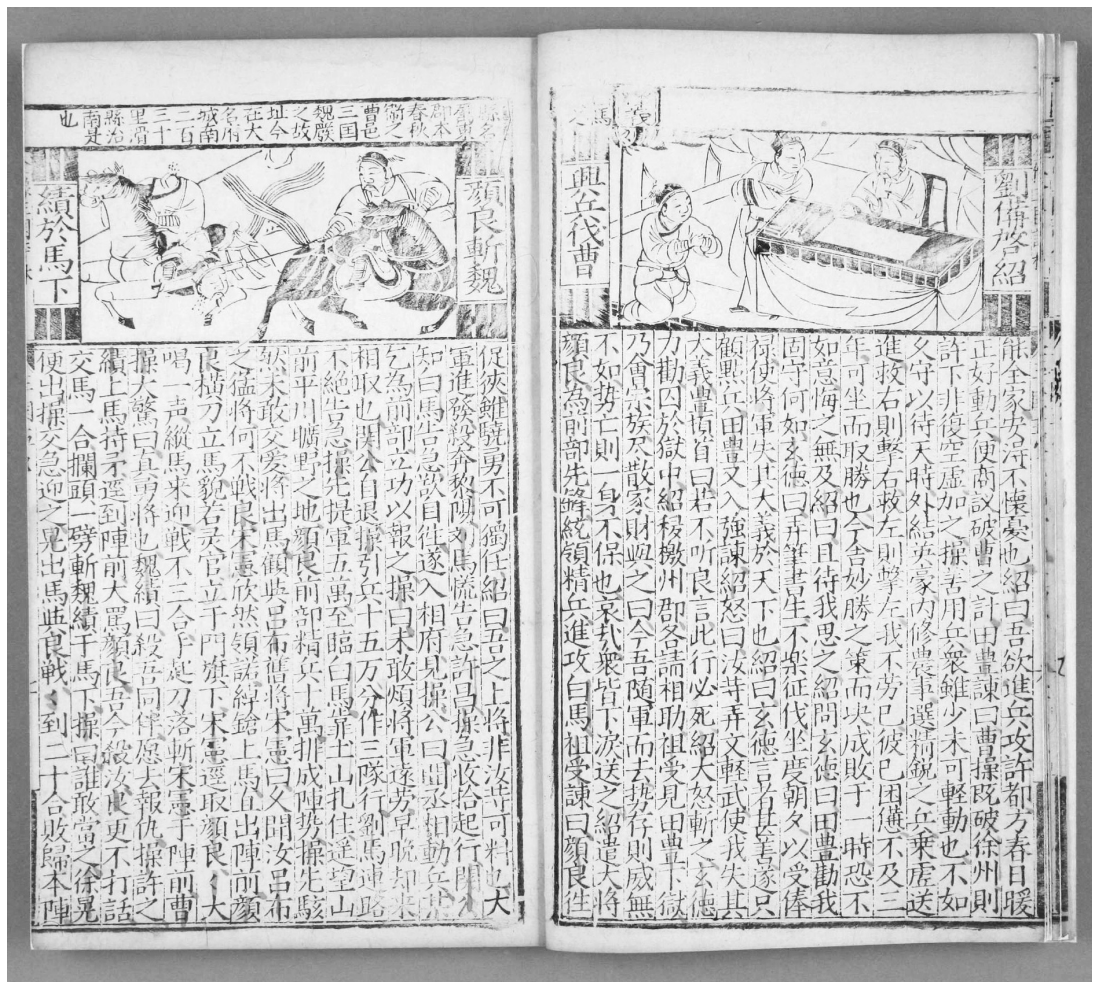
⁹³ 《三國演義》為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的長篇小說，並非一人一時之作，故言最後寫定者而非作者，羅貫中有可能在《三國演義》成書過程中作出貢獻，但他為《三國演義》最後寫定者這說法則值得商榷。

⁹⁴ 沈伯俊：〈《隋唐志傳》非羅貫中所作〉，《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4期，頁107-14；陳國軍：〈《殘唐五代史演義傳》非羅貫中所作〉，《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1期，頁20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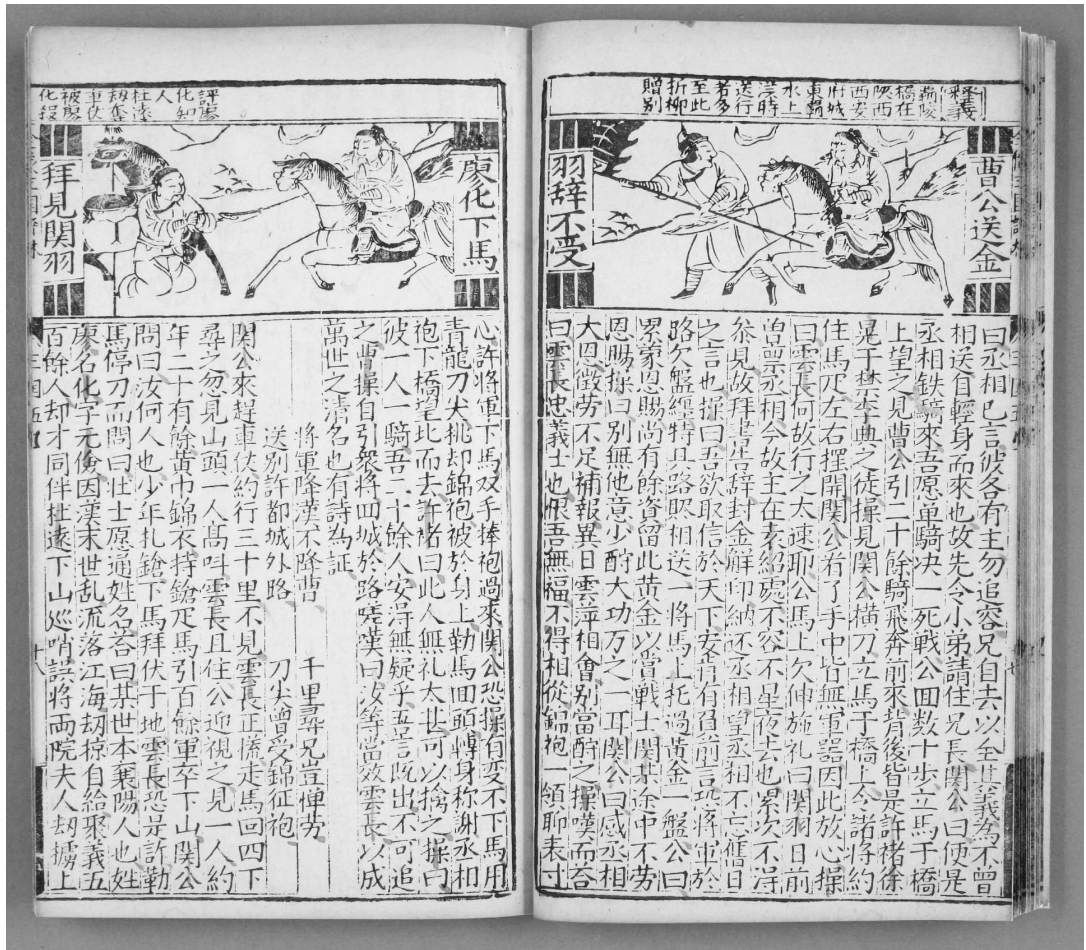
⁹⁵ 蘇軾（1037-1101）《東坡志林》云：「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見《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7。

⁹⁶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33。

⁹⁷ 關於元代的三國雜劇，參陳翔華：〈三國故事劇考略〉，載周兆新（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37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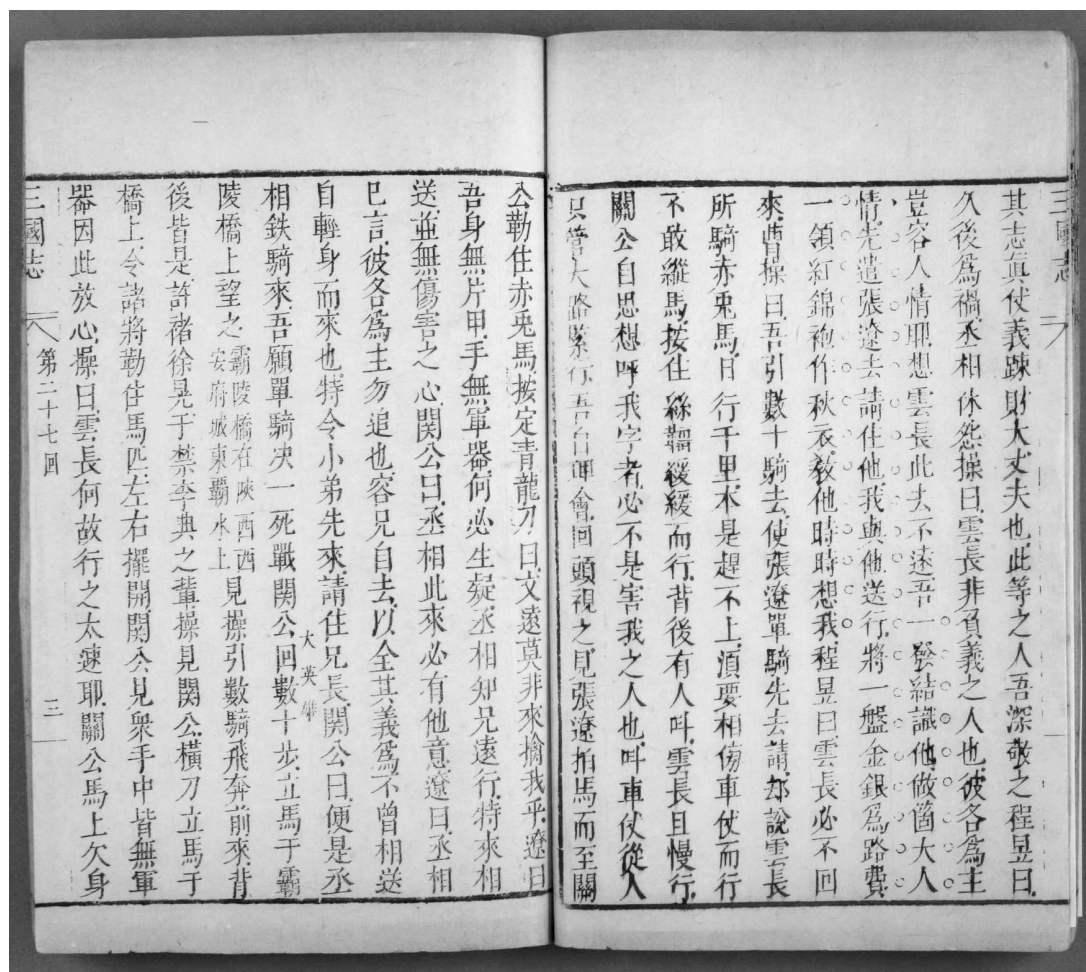
圖一：評林本



圖二：評林本



圖三：李卓吾評本



圖四：李卓吾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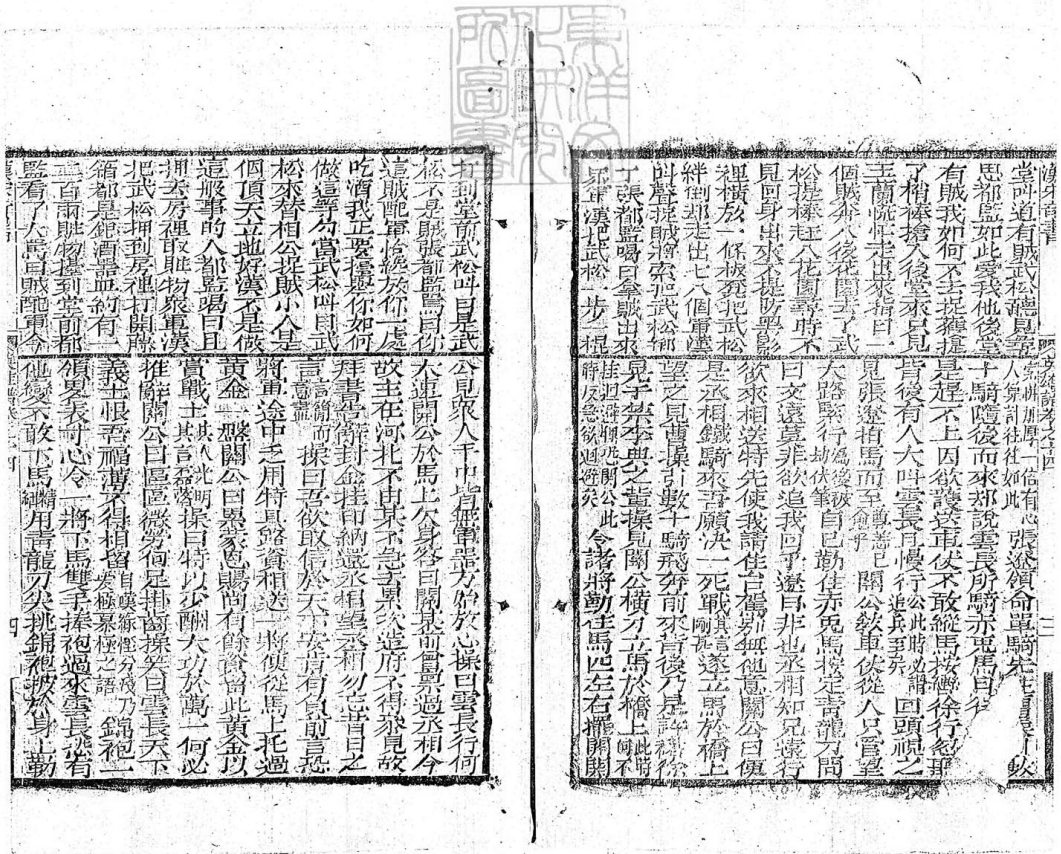


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操視諸將中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起程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又是一箇操曰吾昔日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袁紹玄德而曹操不追關公有始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掛印財賄不以動其心爵祿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操所以何人者不過財安得不敬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箇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為後日記念則不追之索性加厚一倍有心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

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軍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此時必謂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愈善已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為後被劫伏筆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其言甚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掛迴避牌恐關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眾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奈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

圖五：貫華堂第一才子書



圖六：繡像漢宋奇書

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其言甚遂立馬於橋上
 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
 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掛避
 將反急欲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眾人手中
 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大速關公於馬上欠
 身答曰關某前會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
 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納還丞相
 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簡而意盡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
 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
 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
 金以賞戰士其人光明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
 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
 恨吾福薄不得相留自歎緣慳分淺乃錦袍一領略表寸
 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
 細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
 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須臾以錦袍而得不死則曹操
 下橋望北而去操甚歎服公甚落許褚曰此人無禮太
 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代
 之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自曹操自引眾將回城於路嘆
 想雲長不已見如此人安得不惜別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趕
 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只不見不知者讀至此必疑雲長心
 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有

圖七：致遠堂、啟盛堂刊刻之毛評本

From Surrender to Departure: The Story of Guan Yu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Dat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art I)

(Abstract)

Li Ting Yue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Zhu Youdun 朱有燉 having access to the novel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ovel) at the time when he composed the drama entitled *Guan Yunchang Righteously and Bravely Refuses Gold* 關雲長義勇辭金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rama).

By comparing the depiction of the character Xiahou Dun 夏侯惇 in the two works, we believe that the novel did not exist in 1416. Zhu's characterization was based essentially upon the negative portrayal of Xiahou in traditional works such as the *Sanguozhi pinghua* 三國志平話, where he was cast in a rol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find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episodes in these two works: (1) the officer whom Guan Yu 關羽 defeats before he kills Yan Liang 顏良; (2) the person who blinds Xiahou, and (3) the farewell letter penned by Guan Yu. All three cases show that Zhu possessed no awareness of these details in the novel, which leads one to conclude that the novel did not exist in 1416. The date of its composition would have to be within the period of 1435–1457. Its authorship,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羅貫中 (1330–1400), would also have to be refuted.

關鍵詞：《三國演義》《義勇辭金》 成書年代 朱有燉 關羽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ighteously and Bravely Refuses Gold*, date of composition, Zhu Youdun, Guan Yu